

现代中国思想论著选粹

宗教哲学

谢扶雅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现代中国思想论著选粹

宗教哲学

谢扶雅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宗教哲学

谢扶雅著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政编码:250001)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省东营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印张 2插页 160千字

1998年6月第1版 199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7-209-02252-x
B·120 定价:15.00元

总 序

在世纪之交的特殊时刻,人们更加热烈地展望、描绘未来,同时也以复杂的心情回顾、反思着过去。20世纪中国思想学术发展道路,便是这种回顾、反思中的重要课题。应该说,这种回顾、反思不仅仅属于过去,而且联结着未来——联结着中国的21世纪。

人们要确切地了解一个时代思想学术的精神实际,首要在于明了它的社会背景,换句话说,先得吃透这个时代的各种社会矛盾,兼及主要矛盾双方的特点,以及它们在具体社会实践中错综复杂的交互影响,尤其在不断前进中体现的客观发展规律。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学术,同样也离不开这一点。

大家知道,旧中国是贫弱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它是世界上一切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对象,虽还多少不同于当时仅是某一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过去,孙中山先生曾称之为“次殖民地”,那是很恰当的。但中国又是一个广土众民、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即是存在辉煌过去的大国,只是由于长期的闭关自守、政治腐败,乃至影响经济文化等的相对停滞不前,从而大大地落后了。同时由于思想学术没有实现近代化,没能大力发展实验科学的研究,导致综合国力不强,这样,就自然形成了一种

只有挨打的局面。于是西方各种思想,乘虚而入,也就是毫无选择地被介绍进中国来,难免令人眼花缭乱。由于当时人们对自己、外境还缺乏深入调查研究,并不真实地了解本国的国情,加之我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历史又演进得非常快,在思想界便产生了“盲目排外”、“崇洋媚外”等偏向,以致影响到,即使是立场坚定的爱国志士,一时也有未能跟上时代前进,确切知道什么是眼前中国真正需要的,……。历史在曲折中发展,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代表无产阶级领导广大劳动人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这就使得旧封建势力与大资产阶级的各代表自然结成了联合阵线,一致从事抵抗这种新思想,尽管他们各人的动机并不完全相同,面目也不一样;同时也有一些要求进步的学者、思想家,当时限于个人工作和生活的环境,仅从书本上了解到一点马克思主义,由于脱离具体革命实践,自然体会有浅有深,一般说来,不可能摆脱教条主义的影响。这就形成了1949年前非解放区思想学术界的五花八门。但在现实矛盾的发展中,又在酝酿着新的突破。

就与中国传统思想关系而言,思想家、学者们由于接受过去思想文化影响的不同,便有了标榜复兴儒、佛、道学说乃至墨、法……各家的差异。在学风上,有一部分人,喜欢迎合一些外来的新学术,于是,传统的中国学术思想,也有被披上一层外来资产阶级学术的外衣加以传播的。这同样是这个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学术思想的一个特点。自然,其中也有从事比较深入研究而得出的成果,但也有多半出乎牵强比附、乃至臆造完全缺乏科学精神的,要融合东西文化,而且恰到好处,短时间是不可行的。

我们认为要比较全面而深刻地了解本世纪思想学术的全貌,选取有一定社会影响的代表作,经过认真的整理(包括校

注),有计划地出版,是一项有必要的工作。所选著作中有的是当时的名著,其它也都有一定影响、可供研究者参考的。我们这样说,自然并不意味着,这些著作在一切重大问题上,已经得出科学的结论。我们相信读者的批判鉴别力。

严格讲来,不具有高水平的理论修养,兼及工作上实事求是的精神,未经过刻苦的钻研,是很难在短期内写出有价值的学术思想专著。不是真正了解东西方思想文化本来面目和历史发展的,也很难融会贯通而成功地做出有创造性的新贡献。脚踏实地的从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新思想,就得不断结合实践,时时进步,时时创造,以期熔铸古今中外文化精华于一体。这套《现代中国思想论著选粹》的出版,无疑会从一个侧面开拓人们的视野,使不致割断历史,考虑问题更加全面而细致,对提高我国现代思想学术的研究水平,必将有所助益。

是为序。

石 峻

1996年9月25日于北京

重 版 引 言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随着西方科学、哲学和宗教思潮的大量涌入,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构成现代中国思想文化最引人注目的独特风景。特别是近现代西方科学理念的传入,对以人生哲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强大的冲击。这种冲击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弹,1923年终于爆发了中国现代思想史上著名的“科玄论战”,其论争的焦点即在于科学与人生观的关系问题。以张君勱等为代表的“玄学派”认为,人生观的特点是“主观的”、“直觉的”、“自由意见的”,“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以丁文江等为代表的“科学派”则主张,人生观要受科学论理学的公例、定义、方法的支配。经过一年多的论辩,“科玄论战”虽以“科学派”的胜利而告终,但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学术思想界对科学与人生观关系问题的反思却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从与此相关的各个专门领域对这一问题作了更为深入、更为理智的思考和研究。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二三十年代的中國学术思想界突然兴起了一阵宗教学研究的小小热潮,谢扶雅即是其中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

谢扶雅,字乃壬,1892年生于浙江。早年曾赴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宏文书院高等师范学校及立教大学,后转赴美国芝加

哥大学、哈佛大学读研究生,深受在哈佛任教的著名新实在论哲学家怀特海的影响。学成回国后,曾任青年会全国协会干事、私立岭南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岭南学报主编等职。

谢扶雅一生主要致力于宗教学尤其是宗教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他对科学与宗教、人生的关系问题作了深入的哲学思考。早在“科玄论战”全面爆发前的1922年,谢扶雅即写成《道原》(God and Man, 1923年出版)一书。在该书的“序”中,谢扶雅发表了他对科学与宗教关系问题的初步看法,他说:“我们对于宗教上的问题,单用科学的程序和方法,不能得到完全;我们对于上帝,单是到了证明的地步,还不够万分。上帝是人格,不是事物,我们应进而与之握手,与之拥抱,与之同化。”在“科玄论战”中,谢扶雅虽然很少发表文章,但是他无时无刻不在密切关注着论战的进程,并在大规模的论战结束之后,更加埋首于对宗教和人生问题的研究。作为一个受过系统的西方现代高等教育的新实在论者,谢扶雅不同于那些顽固保守的“玄学鬼”,他承认科学发展乃是推动社会和人生进步的重要力量,主张对宗教信仰、人生哲学的研究要本着科学的态度,采取科学的方法,甚至认为宗教信仰本身也要随着科学的进步、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进化。他说:“信仰是进化的,是创造的,是具有生命的。……昨日是真,今日或许成伪;今日是合理的,明日或许成为迷信。”(《新时代的信仰·导言》)比如,对于上帝之存在这一宗教信仰的根本问题,谢扶雅坦承传统上帝观的荒谬,他说:“从科学实证的立场,此世界自可归元为电子,绝无上帝的存在。在这一点上,我与唯物论者完全一致,可以说我亦是一无神论者。”(《科学与宗教·译者序》)不过,谢扶雅同时又指出,科学的发展虽可以破除旧信仰的迷信,促进宗教信仰的进化,但它并不能从根本上彻底解决宗教

信仰和人生哲学问题,更不能完全消除诸如宗教信仰之类的人生精神追求。恰恰相反,正是由于科学的进步、时代的发展,才更需要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新的信仰。他说:“世界进步,日日无已,显微望远,耳目益精,汽电交通,手足愈敏。新环境发生新问题,新局面需要新建设。为扩大新生命、应付新时势起见,怎能没有一个新信仰——新时代的信仰?”(《新时代的信仰·导言》)为科学发展的新时代建立所谓的“新信仰”,正是谢扶雅致力于宗教哲学研究的动力所在。

在多年的宗教学教学与研究中,谢扶雅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不仅在岭南大学主讲宗教哲学、有神论、科学与宗教等多门课程,而且还撰写、翻译、编辑出版了一系列著作,主要包括:《道原》(译述,青年协会书报部刊行,上海,1923年4月)、《新时代的信仰》(编辑,青年协会书报部刊行,上海,1925年)、《宗教哲学》(撰写,青年协会书报部刊行,上海,1927年5月)、《中国伦理思想 ABC》(撰写,世界书局,上海,1929年)、《科学与宗教》(翻译,英国赫求亮 Julian Sorell Huxley 等讲,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出版发行,上海,1933年)、《人生哲学》(撰写,世界书局,上海,1934年)、《基督教纲要》(撰写,中华书局,上海,1934年)、《宗教哲学》(翻译,美国鲁一士 Josiah Royce 著,商务印书馆,上海,1947年10月)、《康德的道德哲学》(翻译,德国康德 Kant 著,基督教辅侨出版社,香港,1960年5月)、《祁克果的人生哲学》(翻译,丹麦祁克果 S. A. Kierkegaard 著,基督教辅侨出版社,香港,1963年7月),以及《人格教育论》、《伦理学》、《游美心痕》等。

1927年5月由青年协会书报部在上海刊行的《宗教哲学》一书,是谢扶雅早年的重要代表作,同时也是我国现代学者对宗

教哲学进行专题研究的第一部具有重要价值的学术专著。在该书的“自序”中,谢扶雅痛切地指出:“在西方,宗教哲学及准宗教哲学一类书本,已不啻数百种,其研究方法,亦年有长足的进步;而中土出版界迄今尚无一部宗教哲学出现,不可谓非我国学术界之耻!”谢扶雅写作出版《宗教哲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想借此对我国的学术思想界“引起一种刺激”,使我们自己的宗教哲学研究能够奋起直追、迎头赶上。

《宗教哲学》一书共五章,其中第一章是绪论,第五章为结论,第二、三、四章则构成全书的主体。

在第一章“绪论”中,作为全书的立足点和出发点,谢扶雅首先对“宗教哲学”作了界定。他指出,宗教本身并非哲学,所谓“宗教哲学”,乃是对宗教进行哲学的研究,换言之,“从哲学的立场,研究及批判人生宗教的活动(指广义的而言,包涵宗教思想、宗教意识、宗教行为),即为宗教哲学。”宗教哲学的任务,不仅包括搜集及选择宗教事实或资料并对之加以解剖和分类,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要从宗教事实中抽象归纳出宗教发展的根本原理,阐明宗教的意义与价值。为了厘清宗教哲学的研究对象——宗教这一人生活活动与其他非宗教的人生活活动之间的界限,谢扶雅进一步探讨了宗教与科学(知的活动)、宗教与美术(美的活动)、宗教与伦理(道德的活动)的关系问题。其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谢扶雅对宗教与科学关系的论述。他批评了那些把宗教与科学截然对立起来的观点,认为,人们通常所说的宗教与科学的冲突,实际上是旧宗教之科学观与现代之科学观、教会中人与科学之士的冲突,而非宗教之本质与科学的冲突。在他看来,今日之进化的宗教不但容纳今日科学各种公律,且应以科学方法来研究宗教,评估宗教事实,阐明宗教的意义及价值。科学的发展不

仅无碍于宗教的进行,而且还能够供给宗教思想以无数资料,充实宗教的内容,开拓宗教的胸怀,广远宗教的眼界。可以说,科学的发展对于宗教的进化实有着重大的贡献。在另一方面,谢扶雅也指出,科学既可以造福于人类,又能够为恶于社会,科学倘能赖宗教之力,则可以避免恶用而益能造福于人群。他说:“科学的头脑与宗教的胸襟,常能互相纠正,互相调和。盖宗教经验必赖理性批判而后免于幻错,科学应用亦恃宗教精神而后免于恶害。”科学的态度与宗教的精神协调一致,不仅是谢扶雅对宗教与科学关系的基本看法,而且还是他对宇宙人生的根本态度。谢扶雅的宗教哲学研究,也正是在这一基本立场上展开的。对于宗教与美术、宗教与伦理的关系问题,谢扶雅也作了详细的论述,指出了它们之间的契合点及相异处。总之,在谢扶雅看来,宗教作为真善美总结合的人生活动,与求知的科学、求美的美术、求善的伦理活动之间,既不能完全等同、相互替代,又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为了使人们更加清晰地了解宗教哲学这门对当时的中国学术界而言还是相当新颖的学科,谢扶雅还仔细辨析了宗教哲学与哲学、宗教哲学与宗教的哲学、宗教哲学与神学之间的异同。谢扶雅所作的这些界定和辨析,从今天的学术发展眼光来看虽不无可商榷之处,但就宗教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在我国建立而言,这种界定和辨析工作无疑具有重要的奠基意义。

在对“宗教哲学”作了严格的界定之后,谢扶雅还简要地回顾了宗教哲学的发展历史,提出了宗教哲学的研究方法。他认为,宗教哲学双跨于科学的研究与玄学(哲学形上学)的研究之间,一方面要秉着客观、科学的态度对宗教现象作历史的、心理的、社会学的实证研究,充分吸收现代宗教心理学、宗教社会学和宗教史的最新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又不能局限于历史学、心理

学或社会学的分部研究,而要以一贯之道统乎其间,对客观的宗教现象作形上学的、认识论的、伦理学的哲学研究,从中抽出宗教发展的普遍原理,揭示宗教的本质、意义与价值。谢扶雅提出的这些基本方针,即使对我们今天的宗教哲学研究来说,也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第二章中,谢扶雅集中探讨了宗教的起源与演进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谢扶雅并不是把从古至今的宗教现象作宗教史式的叙述与陈列,而是对宗教史研究所得的结果作一鸟瞰的考察,借以阐明宗教的本质。谢扶雅认为,综合人类史及宗教史的事实,宗教大体上表现为四个方面,即宗教行为、宗教情感、宗教信仰、宗教思想。在他看来,宗教之演化恰循上列顺序而进,由行为而情感,由情感而信仰,由信仰而思想。当然,这只是就宗教进化过程中其注重点的推移而言,并不是说原始蛮族只有宗教行为而绝无宗教情感及信仰,开化人民只有宗教思想而全然淘去宗教信仰、情感与行为。谢扶雅还从群众性与个人性的角度对宗教的进化历程作了分析,认为原始幼稚的宗教主要表现为群集的行为;其后注重于宗教情感,介乎群众与个人之间;再进而移重心于信仰,个人的意味渐浓;至于理性昌明、宗教思想居于卓越地位之时,则摆脱附和盲从而立足于个人理解与信仰之自由。因此,宗教是从群众性渐进于个人性的。

谢扶雅不仅对整个人类宗教的进化历程作了概括的总体性考察,而且还着重对佛教、儒教和基督教的发展历史作了详细的个案分析和比较研究。在谢扶雅看来,佛教、儒教、基督教不仅是东西方民族最具有代表性的三大宗教,而且皆为处于宗教发展最高阶段的理性宗教,对它们的演化历程进行研究、比较和分析,即可以大体揭示出整个人类宗教发展的普遍规律。通过研

究,谢扶雅认为,儒、佛、耶三教虽各有特点、互不相同,然细审其内奥,亦有颇多重要的一致之处,启示出宗教发展的共同原理:其一,三教皆嬗脱自原始的幼稚宗教而以理性划一界线;其二,三教皆以人事为出发点而非以自然为出发点;第三,三教之最深奥处所谓“天人交通”皆本于认识而非素朴的直观;第四,宗教之盛衰由于权威与理性消长之比例,权威盛则宗教衰,理性强则宗教盛;第五,宗教因时代进化而重心由群众移至个人;第六,理性宗教为世界性的而非国家的或酋族的。由此六点,谢扶雅归纳出宗教进化的三大规律,他认为:“宗教之进化,为:(一)自行为、情感、信仰而至理性化;(二)自群众性而至个别化;(三)自部落的、民族的而至世界化。”这就是所谓的“宗教之三化律”。谢扶雅对儒、释、耶三教所作的这些分析及其对宗教进化规律的总结,虽不可视为定论而予以完全的赞同,但大体而言,其分析论证还是有不无道理的,其中亦不乏发人深省之处,颇值得学术界重视。

谢扶雅不仅借助宗教史的研究成果,从纵的方向对历史上出现的宗教活动资料作了综合的研究,而且还从横的方面,借重宗教心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对表现于人类心理上的宗教现象作了深入的剖析,着力研究了宗教意识问题,这就是本书第三章的基本内容。在该章的正文之前,作为附录,谢扶雅首先对现代西方特别是美国宗教心理学界影响最大的几个主要派别作了简要的介绍和批评。在他看来,构造派(心灵派)与机能派心理学在研究宗教心理意识的时候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构造派注重个人宗教心理的分析而忽视社会宗教心理的研究,机能派则更偏重于社会的方面。由于研究方法的不同,机能派宗教心理学又可分为发生派、实用派与调和派:发生派着眼于原始民族的宗教起源与发展,然以原始民族心理学和儿童心理学的见解概括现代

人的心理活动则有所不妥；实用派则着眼于社会上现行宗教之功用及价值，而付原始宗教于等闲；调和派虽兼采发生派与实用派之两长，既注重发生的研究又顾及机能的说明，然其太偏于社会的方面而轻乎个人的方面，似亦有待于进一步发展。谢扶雅主张，在研究人类宗教意识的时候，对现代西方所流行的各种宗教心理学研究方法要持兼收并蓄的态度，取其所长，弃其所短。这部分内容虽然是以“附录”的形式出现的，而且篇幅不长，但是它表明了谢扶雅研究宗教意识问题的基本方针，因而在本章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在本章的正文中，谢扶雅首先探讨了宗教意识的生长问题。对那种把宗教冲动视为人的先天本能而与食冲动、性冲动鼎足而三的看法，谢扶雅作了严肃的学术批评。他结合着人类群体的进化和个体身心的发育，对宗教意识的发生、发展过程作了详细的考察，认为宗教意识的发生虽与生殖机能、营养机能有密切的关联，但它并不是与食色冲动并列的先天生理本能，而是在二者的刺激之下，胚胎于社会团体意识之中并随着团体意识的发展而生成的。个人的宗教意识也是随着个体身心的发育成长而渐次发展起来的，它既非先天固有的本能，亦非一时来自神的启示。从这种思想观点出发，谢扶雅认为，宗教意识的健正与否，须赖人生经验的积累、理智的训练和科学头脑的养成。他从宗教意识与理性的关系入手，对宗教的祈祷、信仰乃至神契作了深刻的分析，指出，只有经过理性的批判，祈祷、信仰和神契才能避免错觉与迷执而成为真正健全合理的。“宗教是一种态度中正的宗教，态度是以理性为主政”，这就是谢扶雅从宗教心理研究中所得出的结论。在谢扶雅看来，这一结论无论是对于一般的宗教教育，还是对于个人信仰及观念的矫正，皆可提供宝贵的教训。

在上述两章中,谢扶雅主要是借助宗教史学和宗教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对历史上的宗教事项与心理上的宗教经验作了实证的分析,尚未论及宗教所关怀的本质问题。在谢扶雅看来,“历史上之宗教事项与心理上之宗教经验,皆直指上帝、灵魂及自由意志三鹄而趋,可见宗教之大本营,实盘踞于此。”因此,在接下来的第四章中,谢扶雅对宗教所关怀的这些根本问题作了深入的哲学研究。这部分内容在《宗教哲学》一书中所占的篇幅之长、分量之重,是其他各章所不可比拟的。

在该章中,谢扶雅首先对宗教所最为关注的上帝问题作了认真探究。他认为,上帝的有无须视“上帝”究竟何所指而定,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上帝的存在与否,而在于上帝的意义为何。各个时代、各个派别乃至各个人对上帝意义的理解是千差万别的,而究其根本,则在于各自宇宙观的不同。他从宇宙观的差别入手,把现代哲学界流行的各家的宇宙观概括为自然主义、理想主义与实在主义之三大类,分别探讨了其宇宙观与上帝观。谢扶雅认为,自然主义包括唯物论、实证论和进化论三个基本派别,它们的哲学主张虽然各不相同甚至有着很大的差异,但是就宇宙观而言,三者皆把其宇宙观及人生观建立于自然科学知识之上,只承认自然科学知识为最高根据,而不承认非科学或超科学知识的有效性,因而,在上帝观上,它们对上帝的存在持无神论的否定态度(唯物论及实证论)或不可知论的存疑态度(进化论)。与自然主义把宇宙观立于严肃的自然法则之上相反,理想主义则认为,宇宙本体及人生本质非由自然律所能决定,故亦非自然科学知识所能完全企及。谢扶雅回顾了理想主义的发展历史及其复杂派别,指出,从柏拉图的理念论到欧洲大陆纯理派哲学,从经验论哲学家洛克、巴克莱的自然的理想主义和主观的理

想主义到超越论的康德的客观理想主义,乃至 19 世纪以来的浪漫派理想主义、生命派理想主义及实用主义与人格主义的理想主义,其具体的哲学主张、立论方法虽然异彩纷呈,但莫不视人为有限的个体,而把宇宙人生的最后根据付诸超越现象世界的绝对无限,因而,其上帝观也就表现为形形色色的有神论。与对自然主义、理想主义的宇宙观和上帝观多持批评的态度不同,由于深受怀特海、亚历山大等人思想的影响,谢扶雅对实在主义特别是新实在论的观点表示了极大的同情。新实在论是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原理发表之后,受到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刺激而于新近形成的一个哲学派别,它强调要按照科学的精神、采取科学的方法研究哲学,并在这种所谓的“科学方法论”指导下,着重对认识过程及认识主体与被认识事物之间的关系作了研究。它一方面批判了唯心主义“心必优胜于物”的主观论,承认认识对象不依赖于认识关系而独立自存;但在另一方面,它又反对彻底的唯物主义,认为独立存在的认识对象的性质既不是物质的也不是精神的,而是一种“心物交互之关系”。这样,新实在论者一方面把宇宙视为一连串非心非物的事件的迁流(心物交互关系的变化),另一方面又承认在认识关系之外尚有一不变永存的自性世界。这个不依赖于认识关系而独立自存的纯粹实有的世界,即是新实在论者心目中的神或上帝。谢扶雅认为,新实在论的这种宇宙观和上帝观兼采自然主义和理想主义之优长,既完全拥护自然科学研究所得之真理,又承认非自然科学与超自然科学知识的价值和坚实性,在此基础上完全可以建立起“合理的宗教”。在对自然主义、理想主义、实在主义三派的宇宙观和上帝观作了分别叙述之后,谢扶雅对上帝观问题作了总结。他认为,各派哲学家的上帝观不出乎无神论、不知神论与有神论之三种,其

中有神论(指进化的一神论而非原始的多神论)依其神与世界的关系又可划分为超神论、泛神论与内神论。在谢扶雅看来,超神论主张神先世界、超世界、外世界而存在,虽能满足宗教信仰之奢望,然不免有弃绝人世之大弊;泛神论以世界全体为神的直接活动,宣称举目触手尽是神相,虽可供玄学家之陶醉,然终不能显出卓越之神格;内神论则视世界为一大生机体而以神为世界生命的内动力,故神一方面居于世界之中得与吾人经验相接而免弃绝人世之弊,同时又可保有卓越之地位,内在地推动世界生命达于较高较美的层域。谢扶雅认为,较之于超神论的迷信与泛神论的浪漫,内神论是一种更为合理的上帝观。

为了进一步探讨上帝的本性与价值,谢扶雅对宗教及哲学所不可回避的“恶”的问题作了考察。他认为,恶可分为天然的恶与人为的恶,然不论恶的类型及来源如何,人皆有脱离于诸恶的企望,这是一切宗教所赖以产生的基础。但是,古代宗教及欧洲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往往把不近情理的属性如全知、全能、全在、绝对、无限等等累加于上帝,并对上帝的存在作本体论、宇宙论、目的论的证明,致使恶的问题不能得到完满合理的解释,最终导致传统上帝观的破产。在谢扶雅看来,上帝并非外在于人生经验的绝对无限,而毋宁说是立足于经验事实之上的人生理想。每一事情的较完满的方面即上帝之所系,而上帝的价值也正在于引导人生化恶为善,化冲突为和谐,使现实的世界得以改善而趋于理想。因此,在对于现实世界的态度上,谢扶雅既反对泛神论把世界视为最完善无加的浪漫的乐观主义,又反对超神论视世界为最恶劣绝望的悲观主义,而主张内神论积极改进世界的淑世主义。他指出,真正的救赎之道并不是仰赖于外在的神力,而是充分肯定自我的力量,化恶为善。